

低阶层者的系统合理化水平更高吗？ ——基于社会认知视角的考察*

杨沈龙¹ 郭永玉¹ 胡小勇^{1,2} 舒首立^{1,3} 李静¹

(¹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9)

(²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重庆 400715) (³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芜湖 241000)

摘要 系统合理化理论曾提出, 低阶层者比高阶层者具有更高的系统合理化水平, 即更认可社会体系的合理性、更支持当前社会系统。但这一论断一直存在争议。研究引入社会认知视角, 考察低阶层与高阶层者系统合理化水平的差异及其机制。两个分研究得到了共同的结果: (1) 低阶层者的系统合理化水平显著低于高阶层者; (2) 这一差异是通过贫富归因的中介作用实现的, 低阶层者系统合理化水平较低是基于其更少地认为社会贫富差距是由个人内部因素所致; (3) 这一中介作用会受到个体控制感水平的调节, 当控制感较低时, 上述中介作用成立; 但当控制感较高时, 低阶层会弥合与高阶层贫富归因的差异, 中介模型不成立。这些结果支持并发展了系统合理化的认知途径解释和阶层社会认知理论这两个立足于社会认知的理论观点, 显示了认知因素在此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构建了更整合的阶层—归因—合理化的逻辑, 并考虑了其边界因素, 对于了解低阶层者的社会心态及其形成机制, 包括如何改变此状况, 均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

关键词 社会阶层; 系统合理化; 贫富归因; 控制感; 社会认知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贫富分化问题已成为当今很多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 而社会阶层的固化常常使这一困境雪上加霜(Davidai & Gilovich, 2015)。在中国, 情况同样如此。一方面, 连年居高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显示着我国巨大的分配不平等与贫富差距现象; 另一方面, 阶层的固化、代际之间的流动凝滞, 使得经济分配的矛盾得以进一步突显。很多研究显示, 近年来底层民众的向上流动正在变得愈发困难(e.g., 李春玲, 2014; 余秀兰, 2014), 即使完成了高等教育, 出身低阶层家庭的个体上升的通道依然相对狭窄(岳昌君, 张恺, 2014)。在此背景下, 当代低阶层者对于社会系统的态度值得高度关注。他们对于当前社会体系的公正性、合理性作何感受? 其感受有着怎样

的心理基础? 又是否会在某些条件下有所变化? 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仅是维护稳定的需要, 还将有助于我们从建设性的角度出发, 深入了解低阶层民众的心理特点与心理需求, 进而可以为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那么在已往研究中, 心理学对此做过怎样的探讨? 这里不能不提到系统合理化理论(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中的一个观点, 即低阶层者比高阶层者更认为社会系统是合理的, 更支持现存体系(Jost, Pelham, Sheldon, & Sullivan, 2003)。然而, 此观点也一直存在着很大争议(杨沈龙, 郭永玉, 李静, 2013), 因为很多的研究结论恰恰相反, 发现低阶层比高阶层更反对系统(e.g., Brandt, 2013a)。那么与高阶层相比, 低阶层到底是否更认为系统合理呢? 本研究将以此问题为理论出发点, 以中国的不

收稿日期: 2016-01-27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17109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3AZD087), 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类)重大培育项目之重大学术成果培育计划(CCNU14Z02018)资助。

通讯作者: 郭永玉, E-mail: yguo@mail.ccnu.edu.cn

同社会阶层者为现实关注点,考察高低阶层者认可系统合理性的差异,并且基于系统合理化理论的最新理论发展,采用社会认知视角进一步探索该效应的心理机制与边界条件。

1.1 社会阶层与系统合理化

社会阶层(social class)是一种用来反映个体在社会层级阶梯中相对位置高低的社会分类,一个人的社会阶层代表了他(她)所占有的客观社会资源,以及其主观上所感知到的自身社会地位(Kraus, Piff, Mendoza-Denton, Rheinschmidt, & Keltner, 2012; Kraus, Tan, & Tannenbaum, 2013)。系统合理化(system justification)指的是个体维护、支持现存社会体系,并认为其公平、合理、正当的一种倾向(Kay & Jost, 2003, 2014)。一般意义的系统合理化水平可以通过系统合理化量表(system justification scale, Kay & Jost, 2003)测得,此外系统合理化也有一些具体的心理和行为表现(Jost et al., 2014)。立足于理论目的,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系统合理化。

系统合理化理论认为,个体天然地会将自己所处的社会系统视为合理、正当的(Jost & Banaji, 1994)。基于此框架, Jost 等(2003)在一次调查中发现,与高阶层相比,低阶层者有着更高的系统合理化水平,也即更认为系统是合理的。可以看出,这一结果对于系统合理化理论来说有比较特殊的价值,因为它说明个体对系统合理性的感知是可以超越其个人得失的(低阶层在系统中处境不利却仍然认为系统合理),所以“低阶层更认为系统合理”很快成为系统合理化理论中一条重要的观点(e.g., Jost, Banaji, & Nosek, 2004)。然而随着研究的积累,越来越多更有说服力的数据显示了恰恰相反的结论,即低阶层似乎是更反对系统的(e.g., Brandt, 2013a, 2013b; Kraus & Callaghan, 2014; Lee, Pratto, & Johnson, 2011), Brandt (2013a)甚至直接地提出了对于 Jost 等(2003)的数据可重复性的质疑。

更关键的是,认为低阶层者系统合理化水平更高的观点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 Jost 及其同事(2003)曾试图从缓解焦虑的角度解释为什么低阶层会如此,但此解释也没有得到直接的研究支持(e.g., Brandt, 2013a)。Jost 团队最近也承认了这一点,他们表示,低阶层是否更觉系统合理,这一问题是复杂的,不仅关乎焦虑,也需要充分考虑其他心理过程(Kay & Jost, 2014)。但是对于所谓“其他心理过程”, Kay 和 Jost (2014)暂未做出充分阐述。而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以 Brandt (2013a)为代表的“反对

派”也并没有从理论上详细阐明为什么低阶层会更反对系统。也就是说,争论双方都更多地关注阶层对系统合理化直接的预测关系,但缺乏对其机制做更细致的理论阐述。

1.2 社会认知视角的引入:高低阶层者系统合理化的差异及其机制

就在这种情况下,最近有学者(Hussak & Cimpian, 2015)基于认知途径(cognitive pathway),对于系统合理化理论提出了一个补充解释。此解释虽然并没有直接关注阶层与系统合理化的关系,但其思路却恰好可以回应 Kay 和 Jost (2014)上面所说的“其他心理过程”。

该认知途径的解释也同意系统合理化理论最基本的主张,即人会自然地认可社会系统的合理性,但它对系统合理化理论做了一点重要的补充,就是强调个体生来固有的认知倾向是系统合理化最主要的心理基础:个体在知觉外物时更多关注其内在特征,也更多对其结果进行内部归因,当以这种方式去感知社会经济差异(socioeconomic disparity)(如穷人和富人)时,就会自然地认为事物间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其内部因素不同(如之所以有贫富差异是因为富人和穷人自身固有的特征不同),从而对社会经济差异产生理所当然之感,也就因此认为社会系统中的事物都是公正合理、应该被支持的(Hussak & Cimpian, 2015)。在其研究中, Hussak 和 Cimpian (2015)告知被试 Blarks 远比 Orps 富有(两人均为虚构),发现被试确实更倾向于对此差异做内归因解释(因为 Blarks 比 Orp 聪明、能干),而且内归因强度正向预测系统合理化。相关领域研究如 Ng 和 Allen (2005)也发现,个体越倾向于将贫富差异归结于内因(如人与人能力不同、努力程度不同)而非外因(如体制、偏见),则其公平感就越强,而且个体的贫富归因甚至比个体自身是否获益更能有效预测其公平感。这充分地体现了认知因素(贫富归因)在此问题中的关键作用,说明从认知途径来理解系统合理化的成因,确是值得借鉴的。

不过,认知途径解释(Hussak & Cimpian, 2015)对系统合理化的理解似乎还是有一定局限,因为它默认所有人在归因时都是更注重内部因素,却忽略了个体差异。而恰恰对于我们所关注的低阶层,其归因倾向可能是正相反的——作为社会阶层心理学(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领域最有影响理论之一的阶层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social class)就明确阐述过:低阶层的认知模式是情

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即更多认为人的行为会受到外部情境因素的影响;而高阶层更注重自我本身,更多认为人的行为主要是由个体内部因素决定(Kraus et al, 2012; 胡小勇, 李静, 芦学璋, 郭永玉, 2014)。很多研究也都显示低阶层的归因倾向确实较为忽略内部因素而更注重外部因素(e.g., Grossmann & Varnum, 2011), 包括对贫富的归因(Kraus, Piff, & Keltner, 2009; 李静, 2014)。这说明对于低阶层者来说,系统合理化的认知基础相对来说并不存在。换言之,认知途径解释(Hussak & Cimpian, 2015)将个体对于贫富的内归因倾向作为系统合理化的形成机制,这一视角是可取的,但它却没能充分考虑低阶层者所具有的不同归因倾向,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的系统合理化结果。

现在让我们回归研究问题,低阶层者系统合理化水平更高吗?基于上述理论推导,本研究认为低阶层者的归因倾向与形成系统合理化的认知基础是恰恰相反的,因此会倾向于更少地认为系统合理。再从研究上看,更多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大样本(e.g. Brandt, 2013a; Lee et al., 2011)和跨文化(Whyte & Han, 2008)的数据都显示低阶层更为反对系统。最后从现实上看,低阶层者也确实面临更多的不公(e.g., 李春玲, 2014)。因此基于理论、研究和现实的多重考虑,本研究提出:

假设 1: 与高阶层者相比,低阶层者的系统合理化水平相对较低。

此外,上述理论分析显示,对于贫富差距的归因倾向可能是低阶层者系统合理化水平较低的中介因素:阶层社会认知理论(Kraus et al., 2012)揭示了阶层与贫富归因的关系,系统合理化的认知途径解释(Hussak & Cimpian, 2015)又阐述了贫富归因对于系统合理化的重要作用,当我们将这两个立足于社会认知的理论框架相结合,可以看出个体的阶层水平、贫富归因倾向和系统合理化之间,也许存在着阶层—归因—合理化的逻辑链条关系。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 2: 贫富归因在社会阶层与系统合理化间起到中介作用,社会阶层越低,就会越少地对贫富差距做内归因解释,并基于此表现更低的系统合理化倾向。

1.3 社会认知过程的边界:控制感的调节作用

在假设 2 的基础上,研究还将进一步考察上述中介模型成立的边界条件。为此我们还是要借助社会认知的理论框架,看什么因素能对低阶层者的这

一认知机制产生影响。而根据上述阶层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Kraus et al., 2012),控制感(perceived control)恰能起到这一作用。

控制感是个体对于自己掌控事件能力和受到外部限制程度的感知(Lachman & Weaver, 1998; Skinner, 1996),它既是个体差异变量,又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Turiano, Chapman, Agrigoroaei, Infurna, & Lachman, 2014)。在阶层社会认知理论中,控制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Kraus 等(2012)指出,低阶层者之所以在认知过程中更重视外部因素,与他们成长过程中体验到更多的限制有关,而一旦低阶层者的控制感升高,他们也会倾向于表现出类似高阶层的认知模式。Kraus 等(2009)的研究可以为此提供支持:低阶层者在认知活动中比高阶层更多地关注背景性线索,但启动高低阶层都暂时体验到高控制感后,两阶层的差异消失,低阶层也开始更多地注意前景物,转入了“高阶层认知模式”,而高阶层则受控制感的影响不大。还有很多研究从不同角度显示了控制感对于低阶层者的积极作用(Lachman & Weaver, 1998; McCoy, Wellman, Cosley, Saslow, & Epel, 2013; Turiano et al., 2014)。

对于这些理论观点和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其集中归纳为低阶层者对控制感的依赖。表现在社会认知中,就是在控制感较低时,他们的认知倾向是更注重外部背景因素的;但当控制感较高时,他们就倾向于切换到“高阶层模式”,表现出更偏重于内部特征的认知倾向。因此具体到本研究,可以推测:如果低阶层者拥有更多的控制感,也许就可以改变既有认知模式,弥合与高阶层在此认知过程中的差异,继而改变系统合理化水平。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 3: 控制感会调节阶层—贫富归因—系统合理化的中介关系,而且控制感是通过调节阶层预测贫富归因这一路径来实现对中介模型的调节(调节前半路径):当个体控制感较低时该模型成立;而当控制感较高时,该中介模型不成立,高低阶层者贫富归因的差异不显著。

本研究总的假设模型如图 1 所示。为了使结果更稳健,我们设计了两个研究。两研究都将对上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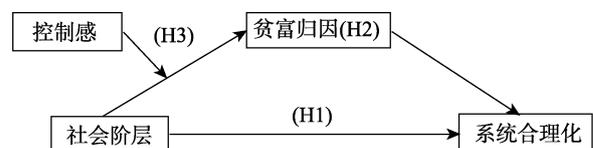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总假设模型

3 个假设依次进行检验,它们除了样本不同以外,主要是对社会阶层和控制感这两个关键变量都将使用两种不同的操作性定义。先说社会阶层,目前比较能代表研究主流的主要是两种思路:一种认为被试对于自身或自己家庭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主观感知(也即主观社会阶层, subjective social class)是最能反映阶层水平的,也是对于预测不同阶层的心理差异最为有效的(Kraus et al., 2013);另一种则是将主观阶层与能反映个体对于社会资源占有状况的客观指标(也即客观社会阶层, objective social class)相结合来体现社会阶层水平(e.g., Dubois, Rucker, & Galinsky, 2015; Tan & Kraus, 2015)。这两种做法都很常见,因此我们拟在两个研究中分别采用主观指标和主、客观合成指标来反映被试的阶层。再说控制感,前文提到它兼具个体特质性和情境可变性,所以对其进行问卷测量和实验操纵也都普遍,很多研究(e.g., Kay, Gaucher, Napier, Callan, & Laurin, 2008)还在不同子研究中综合考虑二者,以此互为验证。因此研究 1 拟对控制感进行实验操纵,研究 2 将采用相关法对其加以测量。

这样总的来看,两个研究可以形成一定的互补关系。研究 1 能更好地揭示控制感与其他变量的因果关系,但既然是实验操纵,其效应能否在一般的生活中得到体现尚有待检验;而且因为是在实验室进行,样本量相对较小,被试代表性相对较低。而研究 2 通过更大样本的调查,选取不同来源的被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不足加以弥补。

2 研究 1

2.1 方法

2.1.1 被试

招募华中师范大学在校学生作为被试,排除有相关研究经历和未能完成研究过程的被试后,得到有效数据 241 份,其中男性 110 人,平均年龄 21.77 岁($SD = 2.37$)。

2.1.2 研究程序和研究工具

研究的自变量为社会阶层,用量表测得,以连续变量计入统计;调节变量为控制感,采用实验操纵。研究流程参照 Kraus 等(2009)的设计。被试来到实验室后,首先测量其基本信息和家庭社会阶层水平。之后随机将被试分入高控制感启动组或低控制感启动组,操纵其形成较高或较低控制感的状态,继而测量被试的贫富归因与系统合理化水平。全部完成后,发放礼品,讲解研究目的。

阶层的测量采用国内外同类研究常用的阶梯量表(Adler, Epel, Castellazzo, & Ickovics, 2000),给被试呈现图 2 中所示阶梯,让其想象这个梯子代表了中国不同的家庭所处的不同的阶层,等级越高,表示其所处的阶层地位越高。让被试报告他觉得自己出身的家庭位于 1~10 中的哪一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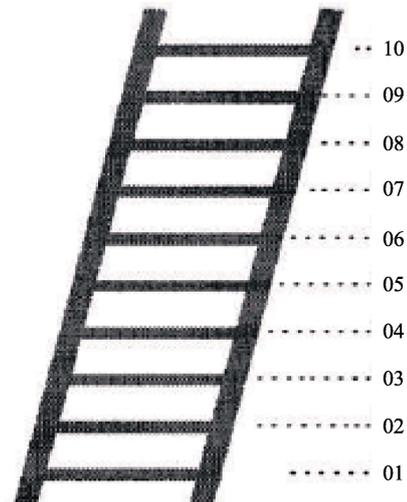


图 2 阶梯量表

控制感操纵采用该领域常用的回忆任务(e.g. Friesen, Kay, Eibach, & Galinsky, 2014; Kay et al., 2008)。这个任务就是让被试自由回忆并写下一件他们体验到完全掌控(启动高控制感)或者无能为力(启动低控制感)的事件,来使他们暂时体验到不同控制感的状态。遵照之前学者(e.g., Shepherd, Kay, Landau, & Keefer, 2011)建议,研究通过预实验来考察操纵效果,66 名大学生被试(与研究 1 样本不同,其中男性 27 人,平均年龄 21.0 岁)被随机分入这两个启动组,之后采用 Lachman 和 Weaver (1998)编制的控制感量表对其启动后的控制感水平进行测量($\alpha = 0.83$)。结果显示高控制感启动组的控制感显著高于低控制感启动组, $t(64) = 2.92, p < 0.01, d = 0.73$,证明该实验操纵确实可以影响被试即时的控制感水平。

贫富归因的测量采取李静(2014)编制的具有良好信效度水平的贫富差距归因问卷,包括了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两个维度,各有 8 个项目。问卷基于广泛地城乡调查和项目分析,列出了可能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原因,内归因的条目如“个人勤奋或努力程度不同”、“个人的能力不同”等;外归因的条目如“有无关系或门路”、“家庭背景或出身不同”等内容。对于每一种归因,让被试报告其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采取 7 点计分。在计算总分时,由于研究

在理论上更强调的是内归因倾向, 依照前人研究 (Hussak & Cimpian, 2015) 做法, 也是工具编制者 (李静, 2014) 的建议, 取被试在内归因分量表上的 8 道题总分与外归因量表上 8 题总分的差值, 作为贫富归因的得分, 得分越高, 表示被试的内归因倾向越高。在本研究中, 内、外归因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65、0.78。

系统合理化的测量采用该领域研究中常用的系统合理化量表 (Kay & Jost, 2003)。该量表测查被试对系统是否公平、是否惠民等问题的感知, 如“中国政府的大多数政策都给民众带来了好处”、“中国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反向计分)”, 量表共 8 道题目(2 道反向计分), 采用 7 点计分。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 得分越高代表被试系统合理化水平越高 ($\alpha = 0.75$)。

统计分析通过 SPSS18.0 完成。对于是否需要对一些因素如人口学变量做统计控制 (statistical control), 研究遵循了心理统计学者最新的建议 (e.g., Becker et al., 2016; Bernerth & Aguinis, 2016), 因为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关注上述变量本身在现实社会中的真实关系, 而不存在明确理论目的需要排除某些协变量的干扰, 所以本研究在数据处理时未考虑统计控制 (研究 2 同理)。

2.2 结果

2.2.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如表 1 示, 其中性别和控制感采用虚拟变量, “1”为男性, “0”为女性; “1”为高控制感组, “0”为低控制感组, 后同。可以看到社会阶层与系统合理化存在显著正相关 ($r = 0.15, p < 0.05$), 假设 1 得到支持。阶层和贫富归因 ($r = 0.15, p < 0.05$)、贫富归因和系统合理化 ($r = 0.37, p < 0.001$) 的正相关关系也均显著。

2.2.2 中介效应检验

将所有被试数据代入假设 2 的中介模型中加以

检验, 根据心理统计学者 (Hayes, 2013) 建议, 使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检验 (抽取 1000 个样本)。结果显示, 社会阶层对系统合理化总的预测效应显著 ($B = 0.09, SE = 0.04, p < 0.05$), 95% 的置信区间 (confidence interval, CI) 为 [0.01, 0.16], 假设 1 得到验证; 社会阶层对贫富归因的预测作用显著 ($B = 0.76, SE = 0.32, p < 0.05$), 95% CI 为 [0.12, 1.40]; 同时纳入社会阶层和贫富归因后, 社会阶层对系统合理化的预测不显著 ($B = 0.06, SE = 0.04, p > 0.05$), 95% CI 为 [-0.01, 0.13], 贫富归因对系统合理化的预测作用显著 ($B = 0.04, SE = 0.01, p < 0.001$), 95% CI 为 [0.03, 0.06]。贫富归因的中介效应为 0.032, 95% CI 为 [0.006, 0.069], 占总效应的 35.9%。以上结果表明贫富归因在阶层预测系统合理化中起中介作用 (但不作为完全中介作用, 参见温忠麟和叶宝娟 (2014a), 研究 2 同理), 假设 2 得到支持。

2.2.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假设 3 的理论模型是控制感对中介模型前半段的调节作用, 因此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 (2014b) 所建议的检验方法, 应对如下 3 个方程进行检验 (如表 2 所示, 下列结果通过 bootstrap 检验得出, 抽 1000 个样本)。首先检验的回归方程为系统合理化 = $c_0 + c_1$ 社会阶层 + c_2 控制感 + c_3 社会阶层 \times 控制感 + e_1 (方程 1)。结果表明, 社会阶层与控制感的交互项对系统合理化的预测不显著 ($B = -0.15, SE = 0.08, p > 0.05$), 95% CI 为 [-0.31, 0.01]。接下来检验方程贫富归因 = $a_0 + a_1$ 社会阶层 + a_2 控制感 + a_3 社会阶层 \times 控制感 + e_2 (方程 2) 和系统合理化 = $c_0' + c_1'$ 社会阶层 + b_1 贫富归因 + e_3 (方程 3)。方程 2 的检验结果表明, 社会阶层与控制感的交互项对贫富归因的预测显著 ($B = -1.58, SE = 0.67, p < 0.05$), 95% CI 为 [-2.90, -0.26]。方程 3 的检验结果表明, 贫富归因对系统合理化的预测显著 ($B = 0.04, SE = 0.01, p < 0.001$), 95% CI 为 [0.03, 0.06]。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N = 241$)

变量	<i>M</i>	<i>SD</i>	1	2	3	4	5	6
1. 性别	0.46	0.50	1					
2. 年龄	21.77	2.37	0.03	1				
3. 社会阶层	4.33	1.42	-0.09	-0.02	1			
4. 控制感	0.47	0.50	0.03	-0.06	0.08	1		
5. 贫富归因	2.88	7.19	0.07	-0.19**	0.15*	0.11	1	
6. 系统合理化	3.98	0.85	-0.09	-0.02	0.15*	0.05	0.37***	1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下同

表 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N = 241$)

预测变量	回归方程 1(系统合理化)				回归方程 2(贫富归因)				回归方程 3(系统合理化)			
	<i>B</i>	<i>SE</i>	<i>t</i>	95%CI	<i>B</i>	<i>SE</i>	<i>t</i>	95%CI	<i>B</i>	<i>SE</i>	<i>t</i>	95%CI
阶层	0.08	0.04	2.03*	[0.00, 0.16]	0.64	0.33	1.91	[-0.02, 1.29]	0.06	0.03	1.66	[-0.01, 0.13]
控制感	0.06	0.11	0.59	[-0.15, 0.28]	1.43	0.91	1.57	[-0.37, 3.23]				
贫富归因									0.04	0.01	5.74***	[0.03, 0.06]
交互项	-0.15	0.08	-1.92	[-0.31, 0.01]	-1.58	0.67	-2.36*	[-2.90, -0.26]				
R^2			0.04				0.06				0.15	
F			3.03*				4.85**				19.05***	

(2014b)提出的标准,本研究预期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得到支持。为了深入了解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实质,进一步通过简单斜率检验来考察不同控制感条件下阶层对贫富归因的预测效应。结果显示,低控制感条件下,社会阶层对贫富归因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 = 1.39, SE = 0.44, p < 0.01$), 95%CI 为 [0.52, 2.25]; 但在高控制感条件下,低阶层的贫富归因与高阶层并无显著差异($B = -0.20, SE = 0.51, p > 0.05$), 95%CI 为 [-1.20, 0.81] (如图 3)。最后考察在调节变量不同水平下的中介效应的不同情况,结果显示在低控制感的情况下,中介效应模型成立,非标准化的中介效应为 0.06, 95%CI 为 [0.02, 0.11],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50.6%; 而在高控制感条件下,该中介模型不成立,非标准化的中介效应为 -0.01, 95%CI 为 [-0.06, 0.03], 由于置信区间包括 0, 所以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可以忽略。以上结果共同支持了假设 3 的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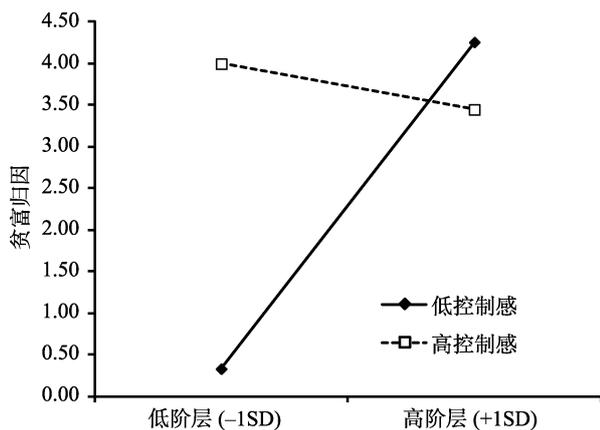


图 3 控制感对社会阶层预测贫富归因的调节作用(研究 1)

2.3 讨论

研究 1 的结果支持了本研究的 3 个假设。首先,来自于越低社会阶层的个体,其系统合理化水平也相对越低,这与系统合理化理论的观点不符(e.g., Jost et al., 2003),但与大多数该领域的研究相一致

(e.g., Brandt, 2013a)。进一步考察发现,借助于贫富归因这一社会认知视角可以比较好地解释这一效应,也即低阶层者系统合理化水平相对较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于人与人何为产生贫富差距的解释更偏向于外部,而较少地感到人可以基于能力或努力等自身因素实现富裕。更进一步来看,这种阶层—归因—合理化的中介逻辑又会受到其控制感水平的调节,若低阶层者体验到较高的控制感则可以弥合与高阶层在归因上的差异,改变此中介过程。该结果支持了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视角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说明从认知机制的角度来理解此问题是可行的。

3 研究 2

3.1 方法

研究 1 支持了全部 3 个假设,但基于本研究的总体考虑,为使结论更加可靠,研究 2 将采用基于更大样本的相关法再次检验上述假设。

3.1.1 被试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法选取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江汉大学、湖北商贸学院在校学生为被试,共得到有效问卷 829 份。其中男生 357 人,平均为 20.71 岁($SD = 2.12$)。

3.1.2 研究工具

社会阶层测量,综合考虑主观阶层与客观阶层两方面指标,并参照同类研究做法(Tan & Kraus, 2015),将主、客观两个指标分别转化为标准分数然后相加,来反映被试所在的社会阶层。主观阶层的测量同研究 1。客观阶层采用陆学艺(2002)提出的基于中国本土化的,以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为依据划分的十大阶层,从高到低包括了从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到城乡无业半失业者共 10 个等级,分别赋值 1~10,让被试报告其父母分别属于哪种职业,反向计分后取父母中较高的分数来代表其家庭的客观阶层水平。

化的预测不显著($B = -0.03, SE = 0.02, p > 0.05$), 95%CI 为 $[-0.08, 0.02]$ 。方程 2 中, 社会阶层与控制感的交互项对贫富归因的预测显著($B = -0.41, SE = 0.18, p < 0.05$), 95%CI 为 $[-0.77, -0.05]$ 。方程 3 中, 贫富归因对系统合理化的预测显著($B = 0.04, SE = 0.00, p < 0.001$), 95%CI 为 $[0.03, 0.05]$ 。据此, 本研究预期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得到支持(温忠麟, 叶宝娟, 2014b)。进一步通过简单斜率检验来考察不同控制感条件下(取正负一个标准差)阶层对贫富归因的预测效应, 结果显示, 低控制感条件下, 社会阶层对贫富归因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 = 0.89, SE = 0.20, p < 0.001$), 95%CI 为 $[0.49, 1.29]$; 但在高控制感条件下, 低阶层的贫富归因与高阶层的差异不再显著($B = 0.29, SE = 0.19, p > 0.05$), 95%CI 为 $[-0.08, 0.66]$ (如图 4)。最后考察在调节变量不同水平下的中介效应的不同情况, 结果显示在低控制感的情况下, 中介效应模型成立, 非标准化的中介效应为 0.04, $p < 0.05$, 95%CI 为 $[0.02, 0.06]$,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71.8%; 而在高控制感条件下, 该中介模型不成立, 标准化的中介效应为 0.01, $p > 0.05$, 95%CI 为 $[-0.01, 0.03]$ 。以上结果共同支持了假设 3 的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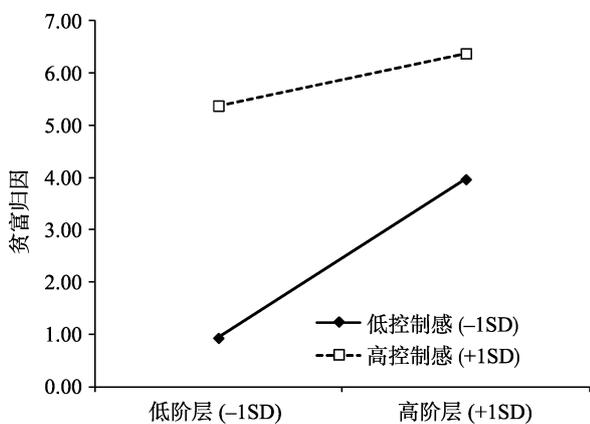


图 4 控制感对社会阶层预测贫富归因的调节作用(研究 2)

3.3 讨论

在研究 1 的基础上, 研究 2 通过更大样本的调查, 同样验证了社会阶层预测系统合理化的效应和社会阶层—贫富归因—系统合理化的中介关系, 并且结果再次表明这一关系会受到控制感的调节。因为研究 2 关注的是更广泛的样本, 测查的也是一般化的状态, 所以比研究 1 更具有说服力; 但研究 1 因为操纵了控制感, 能够更好地体现它与贫富归因和系统合理化的因果关系。总之, 两个研究可以互

为验证, 共同为上述 3 个假设提供了比较坚实的支持。

4 总讨论

4.1 社会阶层与系统合理化的关系

本研究的两组数据都表明, 个体社会阶层越低就会越少地支持现存系统。显然此结果并不符合系统合理化理论中“低阶层更认为系统合理”(Jost et al., 2003)的观点; 但从系统合理化理论最近的表述来看, 其观点也并非一味强调这一效应必然成立(Kay & Jost, 2014)。因此, 基于中国样本对此效应进行检验是很有必要的。而且, 对于系统合理化理论和本问题来说, 中国的低阶层者具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因为系统合理化理论起源于美国, 而“美国梦”的盛行使得美国人普遍认为只要努力就能成功(Kraus & Stephens, 2012), 即便低阶层者也向上流动有乐观的预期(Kraus & Tan, 2015), 因此可以说“低阶层更认为系统合理”的提出, 是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的。但是在中国, 阶层固化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低阶层者向上流动的信心(余秀兰, 2014), 这种差异是较为明显的¹。因此, 本研究的数据对于系统合理化理论来说是宝贵的, 而且研究结果也并不支持“低阶层更认为系统合理”的观点, 充分说明系统合理化理论有必要更多考虑不同的人群和文化(e.g., Cichocka & Jost, 2014)。

显然, 本研究结论远不足以推翻 Jost 等(2003)的理论观点, 但可以为进一步探索该问题提供启示: 阶层与系统合理化的关系也许不可避免地具体的文化和群体有关, 也就是说, 在某些特定的社会体系中, 低阶层可能确实会更认为系统合理; 在另一些体系中则可能恰恰相反。值得一提的是, 最近 Jost 团队也提出, 阶层与系统合理化的关系可能并不是确定的, 这取决于低阶层者权力感的高低和对系统经济结果的依赖程度, 当然在研究中他们只是重点考察了权力感与结果依赖对于系统合理化的影响而没有真正涉及到阶层(van der Toorn et al., 2015), 但这一思路与本研究还是有着一定的共通性, 即都是考虑要将此问题做更全面、细致的区分, 而不再笼统地强调低阶层一定更认可系统的合理性。这也许是未来更深入地考察此问题的一个研究方向。

4.2 贫富归因的中介作用

在假设 1 的基础上, 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贫

¹此处所讲的中美差异仅在于心理层面, 而不是客观的社会流动性。事实上, 研究表明美国的阶层固化也很严重, 只是美国人过高估计了阶层流动的可能(Kraus & Tan, 2015)。

富归因是阶层预测系统合理化的中介变量，体现了认知途径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系统合理化理论更多强调人们这种对系统合理性的认可是为了缓解因无法改变系统而产生的焦虑(e.g., Jost & Hunyady, 2005)，而较为忽略认知因素的作用(Hussak & Cimpian, 2015)。我们并不否认缓解焦虑这一思路的理论价值，但是具体到社会阶层预测系统合理化的问题，即使 Kay 和 Jost (2014)也承认缓解焦虑这一解释思路并不完善；而且 Hussak 和 Cimpian (2015)的研究表明即使控制了焦虑因素，内归因倾向依然可以很好地预测系统合理化。因此本研究将理论视角定位于认知途径，让阶层社会认知理论(Kraus et al., 2012)和系统合理化的认知途径解释(Hussak & Cimpian, 2015)这两个立足于社会认知的理论形成了一次对话，构建起“阶层—归因—合理化”这一更完整的逻辑链。可以说，本研究是利用了系统合理化理论的最新思路(认知途径观点)，对于该理论的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给出了一种解释。

此外研究结果也支持和扩展了上述两个社会认知理论。对于阶层社会认知理论来说，其核心观点就是高低阶层有根本性的认知倾向差异，而且该差异可以作为高低阶层许多方面差异的解释机制(Kraus, Piff, & Keltner, 2011)，本研究将这种认知差异的解释力扩展到系统合理化层面，进一步扩展了该理论的外延。同时，本研究也部分地支持并发展了系统合理化的认知途径解释(Hussak & Cimpian, 2015)，因为该理论主要强调的是高阶层的典型认知倾向(内归因)，而我们更强调低阶层者不认为系统合理是因为他们贫富内归因倾向较弱，可以说是针对此理论的偏颇之处做了必要补充。

4.3 控制感的调节作用

那么对于如上中介过程，何时又会有所变化？或者说如何改变低阶层者外归因—反对系统的模式？本研究发现提升控制感可以起到这一作用。这再次支持了阶层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即控制感的升高可以改变低阶层者的认知倾向(Kraus et al., 2009, 2012)。不过该理论并未直接考察过控制感对低阶层者归因的影响，本研究对这一点给予了补充，并且还考察了这一作用的后效——系统合理化水平，延伸了控制感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社会阶层心理学领域另一重要理论——社会文化视角(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也非常重视控制感对于低阶层者的作用，并且也强调了控制感升高时低阶层

可以转入“高阶层模式”(Stephens, Markus, & Phillips, 2014)。其实，如何帮助低阶层转变固有的心理模式以促进其更好地向上流动，已成为社会阶层心理学新的发展方向(e.g., Stephens et al., 2014)，未来这一领域可以更多考虑控制感在其中的作用。

当然，促进阶层流动，既关乎低阶层个人因素，也关乎社会系统因素，恰如本研究中控制感的操作性定义，既包括主体对外界的掌控感，也包括外界对主体的限制(Lachman & Weaver, 1998)，将这两点结合起来看，本研究中控制感的调节作用成立可以带来很好的启示：要想让低阶层改变归因模式，进而认为系统合理，这需要个体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一方面，个体可以通过简便易行的自我调节方式来提升控制感，例如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执行意向(implementation intention)等策略都被发现具有这种积极作用(e.g., Arbour & Martin Ginis, 2009; Harris, Mayle, Mabbott, & Napper, 2007)。另一方面，社会系统的影响也非常重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通过改变客观社会条件来增进民众的控制感，可能比单纯强调个体进行自我调节来提升控制感更有建设性意义。例如赵志裕，区颖敏，陈静(2008)通过情境模拟实验，发现外部环境对个体的制约越少，被试的控制感就越高；李静(2014)则运用赵志裕等(2008)的实验范式，进一步发现环境制约程度还会影响被试对于自己在实验中所获得代币的归因。这些结论可以为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参考——在低阶层自身进行适度自我调节的同时，社会也应尽可能减少对底层群体的限制壁垒，来进一步帮助其提升控制感，让他们感到自己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财富和成功。这也许是本研究最重要的一点实践启示。

4.4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未来研究继续深入。首先，本研究样本为大学生，尽管从现有研究来看，出身于高(低)阶层家庭的学生所具备的很多心理特点与已经步入社会的高(低)阶层者并无明显差别(Kraus et al., 2012)，而且以学生作为被试来反映社会阶层的效应也是研究中常用的做法(e.g., Na & Chen, 2016; Stephens, Fryberg, Markus, Johnson, & Covarrubias, 2012)，但在将本研究结论推广至更大范围的群体时，还是应该谨慎，未来研究可以更多采用不同的群体来验证本研究的结论。其次，本研究采用系统合理化量表来反映因变量，代表了一般意义的系统合理化，但其实，系统合理化还可

以体现在一些具体细节方面,如政治保守主义(Jetten, Haslam, & Barlow, 2013)、社会支配倾向(Carvacho et al., 2013)等,未来可结合不同的操作性定义对此问题进行更丰富的探讨。最后,本研究更多的是借鉴了系统合理化理论中最新提出的认知途径解释,重点考虑了贫富归因的中介作用,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数据上来看,都不能认为贫富归因是阶层预测系统合理化这一效应中唯一一起作用的机制,正如 Kay 和 Jost (2014)所说,这一过程可能很复杂,未来还可从更多其他心理因素入手,更细致地探索不同阶层形成系统合理化的根源。

5 结论

第一,个体的社会阶层对其系统合理化水平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第二,对贫富分化做出内归因解释是社会阶层预测系统合理化的中介变量,社会阶层越低,就会越少地对贫富分化做内归因解释;而这种内归因越少,其系统合理化也越弱。

第三,社会阶层—贫富归因—系统合理化的中介关系,受到了控制感的调节,在低控制感的情况下,该中介模型成立,高低阶层的贫富内归因倾向差异显著;而在高控制感的情况下,中介模型不成立,高低阶层贫富内归因倾向无显著差异。

参 考 文 献

- Adler, N. E., Epel, E. S., Castellazzo, G., & Ickovics, J. R. (2000). Relationship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with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ing: Preliminary data in healthy, white women. *Health Psychology, 19*, 586–592.
- Arbour, K. P., & Martin Ginis, K. A. (2009).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of the effects of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on women's walking behaviour. *Psychology & Health, 24*, 49–65.
- Becker, T. E., Atinc, G., Breaugh, J. A., Carlson, K. D., Edwards, J. R., & Spector, P. E. (2016). Statistical control in correlational studies: 10 essential recommendations for organizational researcher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7*, 157–167.
- Bernerth, J. B., & Aguinis, H. (2016). A critical review and best-practice recommendations for control variable usage. *Personnel Psychology, 69*, 229–283.
- Brandt, M. J. (2013a). Do the disadvantaged legitimize the social system? A large-scale test of the status-legitimacy hypothe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4*, 765–785.
- Brandt, M. J. (2013b). Low status legitimacy of the government and of business: A reanalysis of Brandt (2013). Available at SSRN 2275189.
- Carvacho, H., Zick, A., Haye, A., González, R., Manzi, J., Kocik, C., & Bertl, M. (2013).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class and prejudice: The roles of education, income, and ideological attitud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3*, 272–285.
- Cichočka, A., & Jost, J. T. (2014). Stripped of illusions? Exploring system justification processes in capitalist and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9*, 6–29.
- Davidai, S., & Gilovich, T. (2015). Building a more mobile America—one income quintile at a tim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 60–71.
- Dubois, D., Rucker, D. D., & Galinsky, A. D. (2015). Social class, power, and selfishness: When and why upper and lower class individuals behave unethicall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 436–449.
- Friesen, J. P., Kay, A. C., Eibach, R. P., & Galinsky, A. D. (2014). Seeking structure in social organization: Compensatory control and the psychological advantages of hierarch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6*, 590–609.
- Grossmann, I., & Varnum, M. E. W. (2011). Social class, culture, and cognition.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2*, 81–89.
- Harris, P. R., Mayle, K., Mabbott, L., & Napper, L. (2007). Self-affirmation reduces smokers' defensiveness to graphic on-pack cigarette warning labels. *Health Psychology, 26*, 437–446.
- Hayes, A. F. (2013).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Hu, X. Y., Li, J., Lu, X. Z., & Guo, Y. Y. (2014).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social class: 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37*, 1509–1517.
- [胡小勇, 李静, 芦学璋, 郭永玉. (2014). 社会阶层的心理学研究: 社会认知视角. *心理科学, 37*, 1509–1517.]
- Hussak, L. J., & Cimpian, A. (2015). An early-emerging explanatory heuristic promotes support for the status quo.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9*, 739–752.
- Jetten, J., Haslam, S. A., & Barlow, F. K. (2013). Bringing back the system: One reason why conservatives are happier than liberals is that higher socioeconomic status gives them access to more group membership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4*, 6–13.
- Jost, J. T., & Banaji, M. R. (1994). The role of stereotyping in system-justific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false consciousnes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 1–27.
- Jost, J. T., Banaji, M. R., & Nosek, B. A. (2004). A decade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Accumulated evidence of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bolstering of the status quo. *Political Psychology, 25*, 881–919.
- Jost, J. T., Hawkins, C. B., Nosek, B. A., Hennes, E. P., Stern, C., Gosling, S. D., & Graham, J. (2014). Belief in a just God (and a just society): A system justification perspective on religious ideology.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34*, 56–81.
- Jost, J. T., & Hunyady, O. (2005).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ystem-justifying ideologi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 260–265.
- Jost, J. T., Pelham, B. W., Sheldon, O., & Sullivan, B. (2003). Social inequality and the reduction of ideological dissonance on behalf of the system: Evidence of enhanced system justification among the disadvantaged.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 13–36.
- Kay, A. C., Gaucher, D., Napier, J. L., Callan, M. J., & Laurin, K. (2008). God and the government: Testing a compensatory control mechanism for the support of external syste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 18–35.
- Kay, A. C., & Jost, J. T. (2003). Complementary justice: Effects of "poor but happy" and "poor but honest" stereotype exemplars on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implicit activation of the justice moti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 Social Psychology*, 85, 823–837.
- Kay, A. C., & Jost, J. T. (2014).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in motivational science: System justification as one of many “autonomous motivational structur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7, 146–147.
- Kraus, M. W., & Callaghan, B. (2014). Noblesse oblige? Social status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maintenance among politicians. *PLoS One*, 9, e85293.
- Kraus, M. W., Piff, P. K., & Keltner, D. (2009). Social class, sense of control, and social explan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 992–1004.
- Kraus, M. W., Piff, P. K., & Keltner, D. (2011). Social class as culture: The convergence of resources and rank in the social realm.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 246–250.
- Kraus, M. W., Piff, P. K., Mendoza-Denton, R., Rheinschmidt, M. L., & Keltner, D. (2012).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 *Psychological Review*, 119, 546–572.
- Kraus, M. W., & Stephens, N. M. (2012). A road map for an emerging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6, 642–656.
- Kraus, M. W., & Tan, J. J. X. (2015). Americans overestimate social class mobil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58, 101–111.
- Kraus, M. W., Tan, J. J. X., & Tannenbaum, M. B. (2013). The social ladder: A rank-based perspective on social class. *Psychological Inquiry*, 24, 81–96.
- Lachman, M. E., & Weaver, S. L. (1998). The sense of control as a moderator of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health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763–773.
- Lee, I. C., Pratto, F., & Johnson, B. T. (2011). Intergroup consensus/disagreement in support of group based hierarchy: An examination of socio-structural and psycho-cultural factor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7, 1029–1064.
- Li, C. L. (2014). Education experience and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mong the post-80s generation: With comments on “The Silent Revolution”.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4), 66–77.
- [李春玲. (2014). “80后”的教育经历与机会不平等——兼评《无声的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 (4), 66–77.]
- Li, J. (2014). *Study on the tendency of attribution on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Guangzhou, China: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李静. (2014). *不同社会阶层对贫富差距的心理归因研究*.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Lu, X. Y. (Ed.). (2002).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class research report*.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陆学艺 (Ed.). (2002).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McCoy, S. K., Wellman, J. D., Cosley, B., Saslow, L., & Epel, E. (2013). Is the belief in meritocracy palliative for members of low status groups? Evidence for a benefit for self-esteem and physical health via perceived control.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3, 307–318.
- Na, J., & Chan, M. Y. (2016).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lower social-class enhances response inhibi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90, 242–246.
- Ng, S. H., & Allen, M. W. (2005). Perception of economic distributive justice: Exploring leading theorie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33, 435–454.
- Shepherd, S., Kay, A. C., Landau, M. J., & Keefer, L. A. (2011). Evidence for the specificity of control motivations in worldview defense: Distinguishing compensatory control from uncertainty management and terror management process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5), 949–958.
- Skinner, E. A. (1996). A guide to constructs of contro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549–570.
- Stephens, N. M., Fryberg, S. A., Markus, H. R., Johnson, C. S., & Covarrubias, R. (2012). Unseen disadvantage: How American universities' focus on independence undermines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 1178–1197.
- Stephens, N. M., Markus, H. R., & Phillips, L. T. (2014). Social class culture cycles: How three gateway contexts shape selves and fuel inequalit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5, 611–634.
- Tan, J. J. X., & Kraus, M. W. (2015). Lay theories about social class buffer lower-class individuals against poor self-rated health and negative affec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1, 446–461.
- Turiano, N. A., Chapman, B. P., Agrigoroaei, S., Infurna, F. J., & Lachman, M. (2014). Perceived control reduces mortality risk at low, not high, education levels. *Health Psychology*, 33, 883–890.
- van der Toorn, J., Feinberg, M., Jost, J. T., Kay, A. C., Tyler, T. R., Willer, R., & Wilmuth, C. (2015). A sense of powerlessness fosters system justific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legitimation of authority, hierarchy, and government. *Political Psychology*, 36, 93–110.
- Wen, Z. L., & Ye, B. J. (2014a). Analyses of mediating e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s and model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 731–745.
- [温忠麟, 叶宝娟. (2014a).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2, 731–745.]
- Wen, Z. L., & Ye, B. J. (2014b). Different methods for testing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s: Competitors or backup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6, 714–726.
- [温忠麟, 叶宝娟. (2014b).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方法: 竞争还是替补?. *心理学报*, 46, 714–726.]
- Whyte, M. K., & Han, C. P. (2008). Popular attitudes towar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Beijing and Warsaw compared.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3, 29–51.
- Yang, S. L., Guo, Y. Y., & Li, J. (2013). Whether lower social class individuals are more likely to believe the social system to be justified.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2245–2255.
- [杨沈龙, 郭永玉, 李静. (2013). 低社会阶层者是否更相信系统公正. *心理科学进展*, 21, 2245–2255.]
- Yu, X. L. (2014). Can education still promote the social mobility.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35, 9–15.
- [余秀兰. (2014). 教育还能促进底层的升迁性社会流动吗. *高等教育研究*, 35, 9–15.]
- Yue, C. J., & Zhang, K. (2014). Research on job-hunting result and starting salary of college graduates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Educational Research*, 35, 72–83.
- [岳昌君, 张恺. (2014). 高校毕业生求职结果及起薪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3年全国高校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教育研究*, 35, 72–83.]
- Chiu, C-y., Au, E. W-M., & Chen, J. (2008). How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ety, culture and thought? The contributions of shared implicit theories. *Chinese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4, 147–170.
- [赵志裕, 区颖敏, 陈静. (2008). 如何研究社会、文化和思想行为间的关系? ——共享内隐论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贡献.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4, 147–170.]
- Zhou, H., & Long, L. R. (2004). Statistical remedies for common method biase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 942–950.
- [周浩, 龙立荣. (2004).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12, 942–950.]

Do lower class individuals possess higher levels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An examination from the 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s

YANG Shenlong¹; GUO Yongyu¹; HU Xiaoyong^{1,2}; SHU Shouli^{1,3}; LI Jing¹

⁽¹⁾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Adolescent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Hubei Human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Key Laboratory, Wuhan 430079, China)

⁽²⁾ Faculty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³⁾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lower class individuals are more likely to view social system as legitimate than those from higher class. Yet, the opposite pattern emerged in many empirical studies suggesting that system justification was stronger among individuals from higher class relative to lower class counterparts. Recently,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proposes that people express a salient tendency of internal attribution when explaining socioeconomic disparities, which serves as a main source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Given the fact that individuals from lower social class are characterized by contextualized cognitive style and external attribution, they may attribute socioeconomic disparities to external factors, and thereby are less likely to support the social system. Thus, we expected that 1) one's social clas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2) an internal attribution for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Moreover, studies derived from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social class demonstrate that the increase in perceived control have potential to help lower class individuals shift their attributional styles from external to internal. We further hypothesized that 3) perceived control could moderate the mediation model proposed in hypothesis 2.

Two studies were designed to test these three hypotheses with different strategies. In Study 1, 241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high or low perceived control priming conditions, and then assessed their attributional tendency regarding the rich-poor gap and system justification, so tha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control on the mediation model could be tested. In study 2, 829 college students from four universities of different levels received scales of social class, perceived control, attributional style for the rich-poor gap and system justification to examine the hypothesized relationships in their actual lives.

The results supported all of the three hypotheses. Firstly, social class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ystem justification. That is, lower social class individuals exhibited fewer tendencies to support the social system. Secondly, attributional tendency for the rich-poor gap mediated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lass and system justification. Lower class individuals were less likely to attribute the disparities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o internal factors (e.g., personal striving, ability), and also displayed lower level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Thirdly, the hypothesized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was also supported; that i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ttribution between social class and system justification was moderated by perceived control. When perceived control was low, the mediating effect was significant; however, when perceived control was high, lower class individuals' internal attributional tendency would become as high as those of higher class, resulting in the absence of the mediation model. Both of the two studies supported consistently all of the above hypotheses.

These results support and expand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which emphasizes the cognitive basis of one's system justification but fails to consid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lasses. This study also proposes an extension to the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social class by combining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social cognition with their system justification. In addition, the connection of the two theories forms a more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class, cognition, and justification. Therefore, the present research is based on 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s. Furthermore,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perceived control can moderate the mediation model. This is not only a further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but a noteworthy suggestion for social governance that lower class individuals' internal attribution and system justification can be altered by an increased sense of mastery of themselves and a decreased sense of restriction from the society.

Key words social class; system justification; attribution for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perceived control; social cognitive